邮箱：3213456266@qq.com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郝富成
□美编：杨蕙菱

新春的红棉袄

□邱凤姣

过了腊月二十，妈妈格外忙碌起来，清理屋后水沟，杀年猪，打豆腐，起过年酒……妈妈个子娇小，体态轻盈，扬着齐耳短发，像春燕一样飞来飞去。冷风将她的脸颊吹得红扑扑的，有时候，她的额头上沁着细细的汗珠。

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米酒醇香，油豆腐金黄，甜酒浓酽，屋里屋外飘散着醉人的气息。妈妈紧赶慢赶，在油灯下熬了几夜，为我们姐弟做了黑绒面子白底的新布鞋。

我们的新衣裳还没有做呢。“新年到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大家乐淘淘”，这是我们自小就会唱的歌谣。新衣裳迟迟做不了，是因为矿工爸爸在加班，要除夕才能回来，妈妈手上钱不够。爸爸请人捎信来，让妈妈去煤矿一趟，把工资和单位发放的过年货领回来。

妈妈挑着小竹箩，一大早出发往三十里以外的煤矿，黄昏才归来。她在堂屋里放下担子，一样一样掏出过年的物资：白糖、草鱼、弟弟的新帽子、我的红绸带……我们的新衣服呢？

妈妈弯下腰，揽住我和弟弟的小肩膀，亲热而又内疚地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的新衣服以后做，好不好？”

我当下就怔住了，撅着嘴看妈妈。妈妈轻轻地叹口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爸爸矿里的一个叔叔家起火，把东西全烧光了，只剩下乌黑的墙壁啦。你们说这一家人怎么过年呀？”

八岁的我瞪大了眼睛。妈妈接着说，爸爸和矿里的工人都商量好了，这个年大家紧一点过，把工资省下来给那个叔叔。

我低下头不说话，觉得爸爸妈妈是对的，但心里还是很失落。过年了，岭上的女孩都像花蝴蝶似的，穿着旧衣裳的我，是不是像躲在草丛里的灰小兔？

夜晚来临，凛冽的风吹散了云彩，星星又大又明亮。我们住在岭上，因为钱不够，村里的电线拉不上，便长期点着煤油灯。此刻，一盏油灯忽闪着橘黄的火焰，照着我们的眼睛。弟弟早早地睡了，我坐在微红的炭火边，看着妈妈从柜子里取出一件衣裳。

这是一件绣着本色梅花的红嫁衣。我听过这件衣裳的故事。十年前，家庭富裕的妈妈嫁给了穷爸爸。出嫁前，太外婆用一块绣花红缎子，给妈妈做了一件漂亮的红棉袄。太外婆拉着妈妈的手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，穿着这件红嫁衣，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。”

妈妈做过新娘，就把红嫁衣藏起来，每天操持一家人的生计。爸爸妈妈的新家，是一间土砖房，一个摇摇晃晃的饭桌。妈妈一门心思养家。她相信太外婆的话：“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。”

待到我出生时，太外婆去世了，红嫁衣成了她留给妈妈的唯一念想，也成为妈妈珍贵的结婚纪念。每年的六月六，妈妈会从柜子的最上层捧出火红的棉袄，在走廊上晾一晾。她总是骄傲地对我说：“看，多漂亮的红棉袄，这是你太外婆给我做的新嫁衣呢！”

这件珍贵的红嫁衣，此刻却被妈妈郑重地托在手中。她思忖一会，将袄子一片一片拆开，长的剪短，宽的裁窄。她手中的剪刀“咔嚓、咔嚓”地响着，火上的烤红薯“滋滋”地冒着糖汁。她凑近油灯，粗糙的手指灵巧地穿针引线，灯光闪烁，照亮了她手中银色的针线。

我懂了，妈妈心爱的红嫁衣将成为我春节的新衣。我出神地看着这一切，突然想：那个烧了房子的叔叔一家，今晚睡在哪里？那么多人把做新衣的钱送给了他们，他们还会冷吗？

妈妈在灯光下飞针走线，面容平静，神情专注。一双皲裂的手，不时捋一捋袖子，掐一掐衣边。这双手，在我的红肚兜上绣过牡丹和蝴蝶，在弟弟的蓝肚兜上绣过红旗和太阳。这双手，为爷爷奶奶做过老棉鞋，为村里的新娘缝过新棉被。这双手，耕田种地，养猪喂鸡。除夕前的夜晚，这双手又要为小女孩缝缀新年的愿望。这双手，一刻不停地编织生活的希望与甜蜜。

除夕这天，父亲回来了。一家人欢欢喜喜吃过团年饭，照例将自己从上到下拾掇得清清爽爽，新年伊始万物干净明亮。夜深时节，岭上的人聚在一起守岁，嗑瓜子、吃糖果、喝甜酒、盘点一年的收成、设想新年的前景……在众人的热闹中，我迫不及待地换上崭新的红棉袄，小辫子上扎两朵红绸花，蹑手蹑脚地藏到了妈妈的身后。

可我还是被大家发现了，所有的眼睛在刹那间亮了。妈妈笑着将我拉到爷爷奶奶的面前，我害羞地低下头。女人们夸妈妈好手艺，男人们分发压岁钱。在这欢乐的时刻，村庄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。爸爸提起早就备好的鞭炮和香烟，打开大门。穿红棉袄的我，赶紧捂住耳朵，脆生生地喊道：“放‘开门炮’啦，新年到啦！”

去外婆家，过跳墩子

□熊明建

儿时走得最多的人户是去外婆家，去外婆家是童年最快乐的事。

每年正月初二是既定去外婆家的日子。外婆生育两男三女，我妈排行老二。因为大姨和我们同村，去外婆家自然是两家同行。后来我爸又把幺姨介绍给了村里一名高考落榜青年，同行的由两家变成了三家。这对于我们同辈的七八个孩子来说，去外婆家成了我们的节日，其热闹和重视程度都毫不逊于春节。过年的新衣大年初一可以不穿，但必须要在初二穿上。

外婆那村叫绿水村，山水相隔，单面步行约两个小时，穿过的山叫南天门，绕过的水叫绿水河。

南天门是县上挂了名的一片林场，柏树密密匝匝，遮天蔽日，一条土路在山腰林间蜿蜒盘绕而过。

绿水河就是流经绿水村的河，说不清谁因谁得名。跨绿水河的跳墩子，是去外婆家的必经之路。跳墩子是先辈们因陋就简的一种过河方式。如果河段中出现了平坦的浅滩，河床是坚硬的石盘，那建一串跳墩子过河就比造一座桥容易多了。条石高约一米二，底部镶嵌在坚硬的河床上。如果石头够大，直接搁在那里也稳稳当当。一步一墩，间隔以成人的步幅。一直让我疑惑的是，靠近外婆家的那边有一深水处的两个墩子是两砣天然巨石，没有任何斧凿的痕迹，石头之大，人力似乎无法搬移。这是怎么来的呢？外婆也说不清楚。

我们小时候是怎样过这跳墩子的呢？这就太有意思了。

第一次都是在父母的背篼中过跳墩子的，两三岁开始父母抱着过，再大点打马肩过，七八岁再过渡到牵着过，十来岁开始勇敢地争取自己过。这个争取过程比较漫长且有反复。牵手，放手，再牵手，再放手……在自己不断的努力和争取中，大人彻底放手了，我们就长大了。而弟弟妹妹又重复着这样的历程。过绿水河跳墩子的方式清晰地成了我们几家孩子成长的标记。三家孩子多，长长的队伍里各种梯次的孩子都有。背在背篼里的小孩，过河前必须把他（她）叫醒，跨墩子时也一步一念叨“过河了”“过河了”，唯恐孩子受到惊吓。每个小孩可能都被六个大人分别牵过手。大姨是最小心的，幺姨叔是最大胆的，好几位小孩都由幺姨叔宣布，“哦，你可以自己过河了！”

春节在外婆家的日子，妈妈和姨娘们要趁这个空闲做全年的手工，一般是给全家每人做一双布鞋，材料都由各自带上去。我们小孩和大人的鞋样都由幺姨负责掌控，存在外婆家。小孩分年龄轮次使用，大人又分男女各有一套。鞋样由报纸剪成，写有归属或编有号码。鞋底是千层底，男式鞋面要用到鱼眼睛和松紧布。晴天，她们在地坝里搭台，分工合作，有人叠千层底，有人搓麻线，还有人用苦楝子熬制的粘接糊刷衬布，场面热闹。幺姨以主人身份创造条件，并现场安排指导。幺姨还会给每家的当家人做一双鞋垫。那鞋垫是用五彩线绣上花鸟或吉祥的字符，水平很高，妈妈和大姨都无法沾手这个代表手艺的活儿。男人们则轻松多了，一副川牌四人斗十四点，或三人打戳牌，小有输赢。经常有队里爱好者来凑场子，散场了主人家热情招呼着一起吃饭。孩子们作业很少，尽情打斗嬉戏。两个舅舅分别接待，吃了这家吃那家，短则两天，长则四五天才回转。回来的时候，小孩兜里都装满了苕干、爆米花，更喜的是两个舅舅分别给每人发有六角“挂挂钱”。如果谁的手头幸运地有了新票儿，那是要被一路羡慕的，谁也别想调换。

外婆去世后，外婆家变成了舅舅家，去的次数渐渐少了。后来大姨去世了，妈妈也离开了我们。再后来心灵手巧的幺姨五十几岁患乳腺癌两年多就走了。是我们都长大了吗？不知不觉一年两年都难得去一次了。也不知何年何月，去外婆家的路已绕过绿水河跳墩子修成了水泥公路。我的家从村里搬到了镇上，又从镇上搬到了县城。车来车往去过几次，车子的便利，几乎遗忘了绿水河跳墩子的存在。

今年一个初冬，二舅八十大寿，回来没有了车子。冬日暖阳，照亮童心。我提议三五亲朋重走绿水河跳墩子。没想到，那条路一经废弃，就不复存在了。多处被水泥公路截断，要么就是新挖地基修了房屋。偶有未被改变的地坡边，也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。我们认准方向凭着记忆左奔右突来到了绿水河河边。眼前的景象令我们唏嘘。西岸傍崖边的路全部垮塌，手脚并用才来到跳墩子端点，只见墩子上长满绿苔，河中间的墩子还断了两步，试了几次还是跨不过去……

外婆不在了，妈妈也离开了我们，绿水河的跳墩子也走不通了，但过跳墩子的记忆连同去外婆家童年的快乐却深深地留在了心底，成为悠悠远远的过去。